

清末官办留美教育初探

朱丽玲

(舟山二中 浙江舟山 316000)

摘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尤其是在官办留美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将容闳爱国维新思想的发展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阐述容闳“教育计划”的在官办留美教育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容闳 “教育计划” 官办 留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 B40-094.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0)03-0056-(03)

自1840年以降,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遭遇千古未遇之奇变的背景下,以容闳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教育,进而形成了通过政府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

一、容闳“教育计划”的形成

19世纪40年代,正当清朝统治者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闭关锁国”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以机器制造机器,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沦为其通商口岸,客观上也把一些西方先进技术、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带到了这些地区。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距澳门西南四英里。身在广东沿海开埠通商的特殊地域环境,使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最先影响。

容闳从7岁起接受西方教育。幼小的心灵特别容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他既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长期在充满基督教文明氛围的校园中学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西方文化的汲纳与倾慕因此与日俱增。这是容闳思想产生变化的根源。

1846年冬,容闳追随勃朗先生来到美国,开始接受正统的西方留学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容闳的爱国情感此时正逐渐形成,孟松学校为勤学寒士专设资助,但毕业后要回国传道,当时正

为经济问题而不知所措的容闳却决意不轻诺此等条件。这七年是年轻的容闳最容易接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时期,也是他人生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1854年,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容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没有忘记学成以后报效自己的祖国。此时此刻的容闳也树立起了坚定信念,他毅然放弃留美工作享受优裕生活的机会,登上美国商船“欧里加号”,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以实现他伟大的“教育计划”。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1]。容闳“教育计划”的精髓是希望通过政府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使祖国文明富强,此时容闳的“教育计划”思想初步形成。

容闳“教育计划”的形成,是他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和不满中国日益破败的政治局面的产物。在放眼世界、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容闳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弥补这种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只有通过发展教育,将西方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民族危机。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才能达到“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2]。这是容闳推行“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

收稿日期: 2009-12-09

作者简介: 朱丽玲(1978-),女,江西赣州人,浙江省舟山市舟山二中政史地组,中教一级,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教育计划”最初推行中的挫折

1855年,容闳回到祖国后,从而开始了他漫长曲折的推行过程。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爱国行为,从其产生到一步一步的推行过程都需要容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忍不拔的品质。容闳回到祖国后,同年六月,容闳通过友人的介绍去美驻华公使处任职,但容闳发现“与予之计划甚左”。于是三个月后自行辞职。

容闳又转赴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但却遭英籍律师全力排拒和当地报纸肆意攻击后深感无以立足的情况,因此他辞去译员的工作。这年后期他北赴上海海关翻译处谋职,但由于痛感于商人与海关暗通声气,更愤慨于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仅英国人充任,中国人不得与英人享有同等权利,为此决意辞职。

容闳在归国前曾立志通过政府选派留学生的“教育计划”,但他并不局限于清政府。于是他目标瞄准了当时与清政府对立的另一政权——太平天国。1860年,容闳与曾兰生及两传教士去南京游历,意在探访天平天国内幕,途中颇受感触,并与干王洪仁玕详言七事,其中有四项与教育有关。如: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设立海军学校;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并且告干王曰:“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但是很快容闳就察觉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3]因此,他失望而返。

容闳爱国维新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他在中国国内教会学校和赴美国留学所接受长期系统的西方教育,使他广泛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使他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从而又使他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因此,当他回国后,深感祖国的落后和危机,也深感肩负救国救民的责任,并把派遣留学生当作改革中国的一种手段。这种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他回国后三迁其业上表现出来,在天京提出七策时是其爱国维新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只不过这种爱国维新思想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妥协性。

三、“教育计划”的具体实施

1863年,正当容闳在通过经商积累巨资推行

其计划时,应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之邀赴安庆商议西式机器厂问题。在赴美成功购买机器后,曾国藩前往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他参观各种机器运转并说明有关应用方法,曾见之大乐,趁此机会,容闳劝其于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授之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将来不用外国机械和工程师。这一想法得到曾国藩的赞许,并不久付诸实施,这使容闳倍受鼓舞。

1870年,天津教案事发,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四人交涉处理此事,丁日昌电召容闳协助翻译,容闳实现其“教育计划”的机会来了。天津教案使曾、李深感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赞同容闳的“教育计划”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4]在1870年冬上奏清廷,并得到批准。

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赞同容闳的“教育计划”是由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人才匮乏成为棘手的问题,曾、李二人把人才的培养看作是中国自强的根本。考虑到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之所长,归国后取长补短,使本国富强,所以曾、李认为“与其由派员前来教习,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之便”。^[5]曾、李在1871年8月16日《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折》中写道“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术,中国皆能培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9]。

容闳的“教育计划”正好符合曾国藩、李鸿章“求强”培养人才的目的,加上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于1866年签定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使留美教育成为可能^[7],这样一个历时16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其具体计划是:派送出洋留学生之数额,暂定120人,分四批,每批30人,按年分送出洋,年龄在12至15岁之间;在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由政府出资,成立留学事务所,容闳被任命为留学副监督。这样一来,在容闳的具体安排之下,1872年夏季末,第一批留学生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了,以后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至此,容闳奔走多年极力倡导的“教育计划”终于得以实施。

1854年至1872年间容闳全身心地倾注于“教育计划”的实施,可以说容闳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最早提出者,也是第一个推动其实现的实践者。容闳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在官办留美教育中起着具体策划的重要作用。由容闳大力促成的官办留美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对当时和现实社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办留美教育的产生从思想上开创了中国人步入近代化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 [1][2][3][4]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9,149,120,126.
- [5]陈光明,周翠娇.曾国藩、李鸿章与近代留学[A].湖南城市学院学报[J].2004(4).
- [6][7]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868.

(责任编辑 梁光霞)

(上接第40页)理论支持、新的制度空间和新的政策保障。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定是更开放的中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融入全球体系,发展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安全性,将日益成为未来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这种发展逻辑决定了党在未来的执政中,必须具有更强的创造力和领导智慧。

(2)不断增强执政党的战略能力。从执政的角度讲,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有三:即资源、体制和战略。在资源和体制相对已定的条件下,战略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战略能力,不仅体现在党具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体现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发展,以广阔的视野和战略的远见,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把握各地方、各单位发展的合理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局部的战略能力和整体的战略能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在改革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3)不断增强执政党保证国家协调和集中的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十三多亿的人口,使其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社会执政,执政党面临的两大挑战是两个:一是整体发展的挑战;二是集中统一的挑战。前者的关键是协调,后者的关键在集中,其中协调是集成的基础,而集中是协调的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展开,这两大挑战会变得更加突出。要应对这两大挑战,除了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构筑有效的调控体制之外,就是要增强执政党自身的集中和统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执政,执政党自身保持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中和统一是实现长期稳固执政的一大关键。

(4)不断增强执政党联系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执政党执政是否有效,最终的评判者不是执政党自身,而是广大人民。

2.从机制、体制和制度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表明,仅仅从主体素质上去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协调自己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机制、体制和制度建设问题。机制、体制和制度问题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诸要素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有效的排列组合。在党的执政活动中,党、国家和社会三大要素的排列组合,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这样,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才能理顺,党的执政能力才会有质的增强。

(责任编辑 詹建志)